

• 社会学研究 •

中国城市居民职业地位获得的性别差异研究

——父母教育和职业对男女两性教育和职业获得的影响

田志鹏,刘爱玉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北京 100871)

摘要: 基于第三次全国妇女地位调查数据,使用路径分析模型研究父母教育、职业对于男女两性教育和职业获得的差异性影响及其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的差异及其原因,我们发现:在子代教育获得上,父亲的教育、职业对男性的教育获得有更强的影响,母亲的教育、职业对女性的教育获得有更强的影响;在子代职业地位获得上,父亲教育、职业对男女两性职业地位获得的总效应均高于母亲的影响;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家庭背景对于个体职业地位获得的影响总体上呈现下降趋势。

关键词: 教育获得; 职业获得; 性别

中图分类号: C91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8860(2015)05-0071-07

一、引言

在社会分层与流动研究中,教育获得和职业流动始终是核心议题之一,同时也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不同国家和地区进行的经验研究证实了性别是造成社会流动分化的重要因素之一,但在具体影响机制和影响程度上却存在一定差异。^{[1][2][3][P34][4][P74]}就我国社会分层与性别的研究而言,主要集中于教育获得的性别差异和职业性别隔离两个研究议题。教育获得的性别差异研究主要关注建国以来教育获得性别不平等的下降趋势,以及导致这一趋势的诸如基础教育扩张、生育率下降、家庭经济地位、城乡差异及性别观念等方面的原

因。^{[5][P13][6][7][8][9]}职业性别隔离研究主要关注我国劳动力市场中长期存在的性别隔离和收入分层现象,以及行业类型、所有制、人力资本、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户籍等方面在再生产职业性别隔离上的作用。^{[10][P86][11][12][13]}

上述研究在讨论教育获得性别差异和职业性别分割时大多使用父母文化程度较高者代表父母受教育程度,使用父亲职业代表家庭社会经济状况,很少有研究区分父亲和母亲的影响深入分析代际流动的具体机制,特别是并未充分讨论母亲教育和母亲职业对于子代教育和职业获得的独立性影响,以及这一影响在子代中所表现出的性别差异,而这对于理解代际流动的内在机制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此,本文使用对女性教育和职业有很好调查的全国妇女地

收稿日期:2014-12-25

作者简介:田志鹏(1990—),男,天津静海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硕士研究生,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劳动社会学、社会分层与流动;刘爱玉,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位调查数据,运用路径模型分解父母职业和父母教育对子代职业地位获得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分析造成代际性别差异可能的原因。

二、理论框架与研究假设

本文的基本理论框架是在扩充布劳-邓肯经典地位获得模型基础上构建的,将性别视角纳入到布劳-邓肯模型是后续研究对该模型的重要改造之一。^{[14][15]}布劳和邓肯将影响个人地位获得的因素分解为先赋性的和自致性的,先赋性因素有父亲职业地位和父亲教育程度,自致性因素有本人教育程度、本人首职以及本人目前职业,建立了一个由上述五个因素构成自变量的社会地位获得因果模型。^[16]因此,在讨论职业获得先赋性因素时,将女性(即母亲的影响)纳入其中也成为分析代际流动问题的必然,而且国内外一些研究已经发现了父亲和母亲对于子代的教育和职业都有显著的影响,纳入母亲的作用对研究代际流动十分重要。^{[1][4][174][8]}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两个研究假设:

假设 1: 在控制了父亲教育、职业影响后,母亲教育、职业对于子代男女两性教育获得均有显著的影响。

假设 2: 在控制了本人教育、本人首职和父亲教育、职业后,母亲教育、职业通过影响子代教育进而影响子代目前职业。

上述两个假设意在验证母亲对子代的教育、职业获得具有独立于父亲的影响,且母亲对子代教育和职业的影响模式与父亲类似。Ros-en 和 Aneshensel 使用路径分析发现父亲对男性、母亲对女性的职业期望有更强的影响^[1],李春玲在研究家庭背景对男性和女性教育获得的差异性影响时发现母亲文化程度的影响要大于父亲文化程度的影响,并且综合来看,父母文化程度对女性的教育地位获得的影响要大于对男性的影响。^[8]本文将通过数据分析讨论父母教育和职业对男性和女性的教育和职业获得的差异性影响,进而讨论父亲对男性教育和职业获得的影响是否更强,母亲对女性教育和职业获得的影响是否更强,因此,本文进而提出以下

假设:

假设 3: 与母亲作用相比,父亲对男性受教育程度的影响更强。

假设 4: 与父亲作用相比,母亲对女性受教育程度的影响更强。

假设 3 和假设 4 可以进一步具体化为以下四个子假设。假设 3a: 父亲受教育程度对男性受教育程度的影响更强;假设 3b: 父亲职业地位对男性受教育程度的影响更强;假设 4a: 母亲受教育程度对女性受教育程度更强;假设 4b: 母亲职业地位对女性受教育程度的影响更强。除此之外,本文通过路径分析模型,进而讨论父母教育和职业对男性和女性职业获得的直接影响、间接影响和总影响,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5: 在总影响上,与母亲作用相比,父亲对男性目前职业获得的影响更强。

假设 6: 在总影响上,与父亲作用相比,母亲对女性目前职业获得的影响更强。

上述假设在具体验证时也会区分父母的教育和职业分别讨论其对男女两性职业获得的总影响,在此不再赘述各个子假设。通过对上述若干研究假设的检验,可以得到当今中国不同性别代际流动的基本模式,增进对两代人社会流动基本关系的理解,特别是可以看到较多研究都缺少的母亲教育和职业对代际流动的具体影响,对于深入理解代际流动的一般模式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数据、变量和模型

(一) 数据

本文分析数据为第三次全国妇女地位调查数据,该调查数据在收集女性教育和职业方面的信息更为全面和详尽,为本文估计母亲对子女地位获得以及父母对女性地位获得的影响提供了更为全面可靠的数据支撑。由于我国城市和乡镇代际流动异质性较强,因此,本文分析对象仅为样本中的城镇人口,为了更为准确的估计路径系数,纳入分析模型的最终样本在所有分析变量上均无缺失值。本文最终分析样本为 7692 人,其男性样本为 3746 人,占最终分析样

本的 48.7% ,女性样本为 3946 人 ,占最终分析样本的 51.3% 。

(二) 变量

本文使用路径分析模型 ,变量可分为三类:其一 ,外生变量 ,包括父亲教育、母亲教育、父亲职业及母亲职业;其二 ,内生变量 ,包括本人教育和本人首职;其三 ,最终结果变量 ,即本人目前职业。

前职业。

本文使用“标准国际职业社会经济地位指数”(ISEI) 测量父亲职业、母亲职业、本人首职以及本人目前职业。在教育的测量上 ,本文使用标准的教育年限进行测量 ,包括对父亲教育、母亲教育以及本人教育的测量。本文分析各变量分性别描述统计情况如表 1 所示。

表 1 研究变量描述统计表

变量	男性(N =3746)		女性(N =3946)	
	平均值	标准差	平均值	标准差
父亲教育	7.25	4.48	7.49	4.39
母亲教育	5.57	4.68	5.73	4.66
父亲职业	34.90	19.30	35.16	19.81
母亲职业	30.80	17.39	30.89	17.62
本人教育	11.80	3.40	11.16	3.78
本人首职	42.06	15.99	40.67	16.71
本人目前职业	45.12	16.01	44.27	16.15

(三) 模型

本文研究在布劳 - 邓肯地位获得模型基础上加入“母亲职业”和“母亲教育”两个变量 ,同样将其作为子代职业地位获得的一个先赋性因素 ,根据相关研究理论 ,区分男性和女性 ,通过逐步删除最不显著变量的方式调整模型 ,最终模型结果如图 1 和图 2 所示。

路径分析模型调整方法 ,即在符合理论的前提下 ,通过逐步删除最不显著的变量 ,直至各阶段回归方程路径系数均显著。

四、研究发现

(一) 男女两性目前职业获得的影响因素

由于本文使用路径分析模型 ,需要根据理论和数据结果对模型进行删减和调整。由于部分回归方程中父母教育和父母职业四个变量相互之间可能存在较强相关 ,本文通过计算方差膨胀因子(VIF) 检验多重共线性问题 ,所有方程均符合 VIF 小于 10 的标准 ,所有方程均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本文各方程的调整均按照

本文在参考职业地位获得相关理论的基础上 ,通过逐步删除最不显著自变量的方法调整方程组中的每一个方程 ,分性别得到图 1 和图 2 两个子代职业获得路径图 ,路径图对应各回归方程的标准化回归系数均在 0.05 的显著水平下显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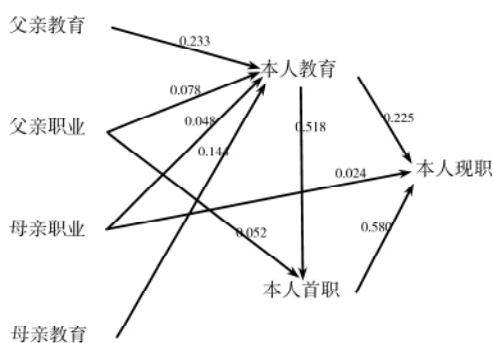


图 1 男性职业获得的路径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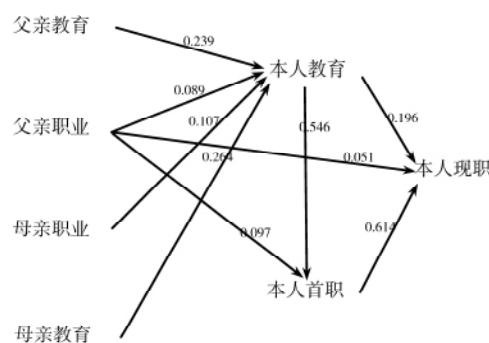


图 2 女性职业获得的路径图

总体上看 ,男女两性职业获得的路径图基

本一致 ,从两个路径图中均可以看到 ,在控制了

父亲教育和父亲职业后,母亲教育和母亲职业对子代教育获得仍然有显著直接影响,本文假设1成立。除了在男性模型中,母亲职业对男性目前职业地位有显著但较弱的影响外,母亲教育和母亲职业对子代首职获得和目前职业获得的影响均是通过影响子代的受教育程度产生的,基本符合本文假设2。

在子代教育获得上,图1和图2的路径系数表明父亲教育对男性教育获得有更强影响,母亲教育对女性教育获得有更强的影响。对男性来说,父亲教育对本人教育获得影响的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233,母亲为0.144,二者之比为1.618,而对女性来说,父亲教育对本人教育获得影响的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239,母亲为0.264,二者之比为0.905。可见,对男性教育获得来说,父亲教育的影响大于母亲教育的影响,而对女性来说,父亲教育的影响小于母亲教育的影响,证实了本文的假设3a和假设4a,与Rosen和Aneshensel研究职业期望时发现的效应类似,父亲对男性、母亲对女性的教育获得有更强的影响。^[1]

与父母教育影响类似,在职业方面,父亲职

业对男性教育获得有更强影响,母亲职业对于女性教育获得有更强的影响,但在控制了父母教育影响后,父母职业的影响相对较弱。对男性来说,父亲职业对本人教育获得影响的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078,母亲为0.048,二者之比为1.625,而对女性来说,母亲职业对本人教育获得影响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089,母亲为0.107,二者之比为0.832。对男性教育获得来说,父亲职业的影响大于母亲职业的影响,而对女性来说,父亲职业的影响小于母亲职业的影响。与父母教育影响的基本结论比较可以发现,父母教育和职业对子代教育获得影响的模式完全一致,即不考虑具体系数的差异,其影响的方向及所呈现的性别差异特征完全相同,证实了本文假设3b和假设4b。

总体上看,父母教育和父母职业主要是通过影响子代教育进而影响子代首职和子代目前职业的。而考察各变量对本人目前职业的影响具有更重要的现实意义,表2报告了各自变量对子代目前职业影响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及总效应。

表2 各自变量对子代目前职业影响作用分解表

变量	男性模型			女性模型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父亲教育	—	0.122	0.122	—	0.127	0.127
母亲教育	—	0.076	0.076	—	0.140	0.140
父亲职业	—	0.071	0.071	0.051	0.107	0.158
母亲职业	0.024	0.025	0.049	—	0.057	0.057
本人教育	0.225	0.300	0.525	0.196	0.335	0.531
本人首职	0.580	—	0.580	0.614	—	0.614
R ²	方程1	0.188		方程4	0.351	
	方程2	0.287		方程5	0.353	
	方程3	0.535		方程6	0.588	
N	3746			3946		

从上表可以看到,父母教育和父母职业对子代目前职业的影响也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1)对男性来说,父亲教育的影响最强,总效应为0.122,均为间接效应,而且父亲教育的影响大于母亲教育的影响,父亲职业的影响大于母亲职业的影响;(2)对女性来说,父亲职业影响最大,总效应为0.158,

其中直接效应为0.051,间接效应为0.107,但是母亲教育的影响却大于父亲教育的影响。可见,对女性来说,母亲教育和职业对其教育更强的影响并未全部传递到目前职业获得上,这主要是由于在控制了本人教育和本人首职后,父亲职业对女性目前职业仍有较强的显著影响(0.051),导致父亲职业对女性目前职业很强

的总效应(0.158)。

讨论父母对本人目前职业的总影响,可以分别加总父亲教育、职业的效应和母亲教育、职业的效应,进而比较总效应上的差异。父亲教育和职业对男性目前职业的总效应为0.193,而母亲教育和职业对男性目前职业的总效应为0.125,二者之比为1.544,父亲教育和职业对女性的总效应为0.258,母亲教育和职业对女性的总效应为0.197,二者之比为1.310。父母对本人目前职业的影响并未表现出其对本人受教育程度类似的影响模式,最大的不同是父亲教育和职业的总效应不管是对男性还是女性都表现出比母亲更强的影响,支持了假设5,否定了假设6,上文也已论证父亲的教育和职业对女性目前职业产生更强影响的原因。

(二) 不同工作时期男女两性职业获得的影响因素

上文详细的讨论了父母的教育程度和职业地位对男女两性教育获得的影响,以及通过教育影响其首个职业和目前职业地位的具体机制和呈现出的性别差异。需要进一步探讨的是,我国市场化转型对应的不同工作时期父辈对子代职业获得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本文根据子代受访者参加工作的时间区分了三个时期:(1)市场化改革前,即1980年及以前;(2)市场化改革早期,1981年至1992年;(3)市场化改革深化时期,即1993年及以后。对于不同时期代际职业流动特征的分析将侧重于父母教育和职业对子代目前职业获得的总效应,各变量对子代目前职业地位获得的总效应如表3所示。

表3 不同时期各变量对男女两性目前职业总效应统计表

解释变量	1980年及以前		1981—1992年		1993年及以后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父亲教育	0.052	0.066	0.131	0.072	0.104	0.126
母亲教育	0.040	0.066	0	0.094	0.045	0.117
父亲职业	0.060	0.230	0.086	0.200	0.119	0.086
母亲职业	0.113	0.155	0.053	0.072	0	0.083
父亲总效应	0.112	0.296	0.217	0.272	0.223	0.212
母亲总效应	0.153	0.221	0.053	0.166	0.045	0.200
父母总效应	0.265	0.517	0.270	0.438	0.268	0.412
本人教育	0.505	0.422	0.529	0.495	0.526	0.548
本人首职	0.520	0.508	0.547	0.585	0.667	0.700
现职总效应	0.856	0.882	0.787	0.835	0.850	0.873
父亲/父母总效应	0.423	0.573	0.804	0.621	0.832	0.515
父母/现职总效应	0.310	0.586	0.343	0.525	0.315	0.472

注①:上表中“父亲总效应”为“父亲教育”和“父亲职业”路径系数之和,“母亲总效应”为“母亲教育”和“母亲职业”路径系数之和,“父母总效应”为“父亲总效应”和“母亲总效应”之和。

注②:上表中“现职总效应”为分别加总各模型中所有对本人现职有直接影响的路径系数。

注③:为进行不同模型之间的比较,表中还计算了“父亲/父母总效应”(“父亲总效应”与“父母总效应”之比)和“父母/现职总效应”(“父母总效应”与“现职总效应”之比)。

由于分析模型均使用标准化回归系数作为路径系数,无法直接比较不同模型之间的系数差异和变化趋势,但可以比较不同时期男女两性模型内各变量影响之比,从而发现不同模型各变量在影响方向和影响程度上的差异。上表中“父亲/父母总效应”,反映了不同时期男女两性受父母影响的差异,从结果看,只有1980年及以前参加工作的男性在目前职业获得上受母亲教育、职业的总影响大于父亲(系数小于0.5),其余五类人均表现出本人职业地位获得

受父亲教育、职业的总影响更大,尽管对1993年及以后参加工作的女性来说,其父母教育、职业的总影响基本相同。对1981年及以后参加工作的男女两性来说,虽然总体上呈现出父亲的教育、职业对本人目前职业地位获得的总影响大于母亲的影响,但也能看到明显的性别差异,即对1981年以后两个时期的男性来说,父亲的影响占父母总影响的百分比依次为80.4%和83.2%,而对这两个时期的女性来说,这一比例依次为62.1%和51.5%,可见,相对于男

性来说,母亲对于女性还是有更强影响的。

加总模型中各变量对本人现职的直接影响的路径系数可以得到所有解释变量对现职影响的总效应,而父母总效应与现职总效应之比表示父母所代表的家庭的影响对本人目前职业获得的解释程度。从结果看,对男性来说,三个时期父母教育、职业对本人目前职业解释程度依次为31.0%、34.3%和31.5%,对女性来说,依次为58.6%、52.5%和47.2%。对比两组数字,可以看到在各个时期,女性目前职业的获得受家庭的影响更多。李春玲研究发现父母文化程度对女性的教育地位获得的总影响要大于对男性的总影响^[8],本文在男女两性职业获得上有类似的发现,并且在不同历史时期这样的差异均存在。在趋势上,家庭背景对男性目前职业地位获得的作用在不同时期基本一致,解释程度基本维持在30%左右,而对女性职业获得的作用却随着工业化和市场化的推进在下降,从58.6%下降到47.2%,但其影响程度也始终高于家庭背景对男性的影响,只是二者的差距在不断缩小。显然,如果不区分性别整体性的考虑家庭背景对个体职业获得的影响,其影响程度无疑是在下降的。

五、母亲影响凸显与子代性别差异的原因

本文发现,在控制了父亲教育、职业的影响后,母亲的教育程度和职业地位对于子代的教育和职业获得有重要的影响,母亲对子代影响显著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是第三产业的迅速发展以及女权运动影响的扩大使得女性参加工作的比例不断提高。而就我国而言,自新中国成立以后,男女平等成为基本国策,出台了一系列保护妇女权益的法律法规,并将“妇女能顶半边天”作为主流意识形态推广,这些政策和意识形态的推广不仅改变了社会对女性能力的评价,也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性别分工,扩展了女性可参与的工作范围,女性劳动者逐渐参与到那些她们过去没有从事过、传统上以男性为主的生产活动中。^[17]改革开放后,我国又相继实施了计划生育和九年义务教育政策,降低了家庭内部对子代投入的性别歧视,切实提高

了女性的受教育程度。如子代教育的性别差异为0.06年,而父母代教育的差异为1.7年(见表1)。综上所述,在第三产业迅速发展的大背景下,在建国后一系列直接、间接促进男女平等的政策下,母亲对子代教育、职业获得影响的凸显自然不难理解。

从子代看,本文发现在子代教育获得上,父亲的教育、职业对男性的教育获得有更强的影响,母亲的教育、职业对女性的教育获得有更强的影响。对此,本文认为有两种可能的解释:其一,家庭亲子沟通的差异,即父子沟通更多,母女沟通更多,相应的,父对子的教育影响更强,母对女的教育影响更强;其二,传统的“重男轻女”观念的影响,即父亲对子代的教育投入有性别差异,而母亲则没有性别差异。尽管我国大力推行男女平等政策,但不得不承认,在社会生活现实中仍广泛存在性别歧视,因此,在现阶段,上述两种原因均发生着影响,只是在不同家庭内两类影响的强弱程度可能不同。在职业获得方面,本文通过分析不同时期父母对本人职业获得的影响,发现家庭背景对个体职业获得的影响在不断下降,而本人教育的作用则在不断上升,这主要是因为随着我国市场化改革和工业化推进,家庭背景对个体职业获得的影响在下降,而以教育为代表的人力资本的作用则在不断上升,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中,绩效、能力等自致性因素逐渐取代性别、年龄等先赋性因素而成为个体地位获得的决定性因素。

六、小 结

本文在传统地位获得模型中加入母亲职业和母亲教育两个变量,进而分性别构建男女两性职业获得路径模型,肯定了母亲在代际职业流动中有着独立于父亲的重要作用,详细探讨了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和职业地位对男女两性的受教育程度和职业地位的差异性影响,并且分时期探讨了这一影响的发展变化趋势。研究发现:在子代教育获得上,父亲的教育、职业对男性的教育获得有更强的影响,母亲的教育、职业对女性的教育获得有更强的影响;在子代职业地位获得上,父亲教育、职业对男女两性职业地

位获得的总效应均高于母亲的影响;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家庭背景对于个体职业地位获得的影响总体上呈现下降趋势。最后,本文对出现上述现象和趋势的原因从政策和现实两方面进行了讨论和解读,对于反思建国后若干国家政策的社会影响,以及探索未来社会政策的改革和制定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

参考文献:

- [1] Rosen, B. C. & C. S. Aneshensel. Sex Differences in the Educational-Occupational Expectation Process [J]. *Social Forces*, 1978, 57(1).
- [2] Lin, N. & Y. Bian. Getting Ahead in Urban China [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91, 97(3).
- [3] Buchmann, C., T. A. DiPrete & A. McDaniel. Gender Inequalities in Education.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008.
- [4] Beller, E., Bringing Intergenerational Social Mobility Research into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Why Mothers Matter [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009.
- [5] Hannum, E. & Y. Xie. Trends in Educational Gender Inequality in China: 1949—1985.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Mobility*, 1994, 13.
- [6] 叶华, 吴晓刚. 生育率下降与中国男女教育的平等化趋势 [J]. *社会学研究* 2011 (5).
- [7] 李春玲. 社会政治变迁与教育机会不平等——家庭背景与制度因素对教育获得的影响 [J]. *中国社会科学* 2003 (3).
- [8] 李春玲. 教育地位获得的性别差异——家庭背景对男性和女性教育地位获得的影响 [J]. *妇女研究论丛* 2009 (1).
- [9] 吴愈晓. 中国城乡居民教育获得的性别差异研究 [J]. *社会* 2012 (4).
- [10] Shu, X. Market Transition and Gender Segregation in Urban China [J].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2005.
- [11] 吴晓刚, 吴愈晓. 1982—2000: 我国非农职业的性别隔离研究 [J]. *社会* 2008 (5).
- [12] 吴晓刚. 城镇的职业性别隔离与收入分层 [J]. *社会学研究* 2009 (4).
- [13] 李春玲, 李实. 市场竞争还是性别歧视——收入性别差异扩大趋势及其原因解释 [J]. *社会学研究*, 2008 (2).
- [14] England, Paula. *Comparable Worth: Theories and Evidence* [M]. New York: Aldine Transaction, 1992.
- [15] 周怡. 布劳-邓肯模型之后——改造抑或挑战 [J]. *社会学研究* 2009 (9).
- [16] Blau, P. M., and O. D. Duncan. *The American Occupational Structure* [M]. New York: Wiley, 1967.
- [17] 金一虹. “铁姑娘”再思考——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社会性别与劳动 [J]. *社会学研究*, 2006 (1).

责任编辑 陈雁洁

Study on Gender Differences in Chinese Urban Occupational Status and Attainment

——Effect of Parental Education and Occupation Background on Education and Occupational Attainment for Both Sexes

TIAN Zhi-peng & LIU Ai-yu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f the Third National Status of Women, this paper uses path analysis model to analyze the different effect of parental education and occupation on education for both sexes and occupational attainment and its differences and their reasons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We have found that in the offspring's educational attainment, father's education and occupation have a stronger effect for men, while mother's education and occupational background having a stronger impact on women; in offspring's occupational status attainment, the total effect of father's education and occupational status of women and men are higher than the mother's influence. With the advance of market-oriented reforms, influence from family background has generally tended to decline for individual occupational status attainment.

Key Words: educational attainment; occupational attainment; gender